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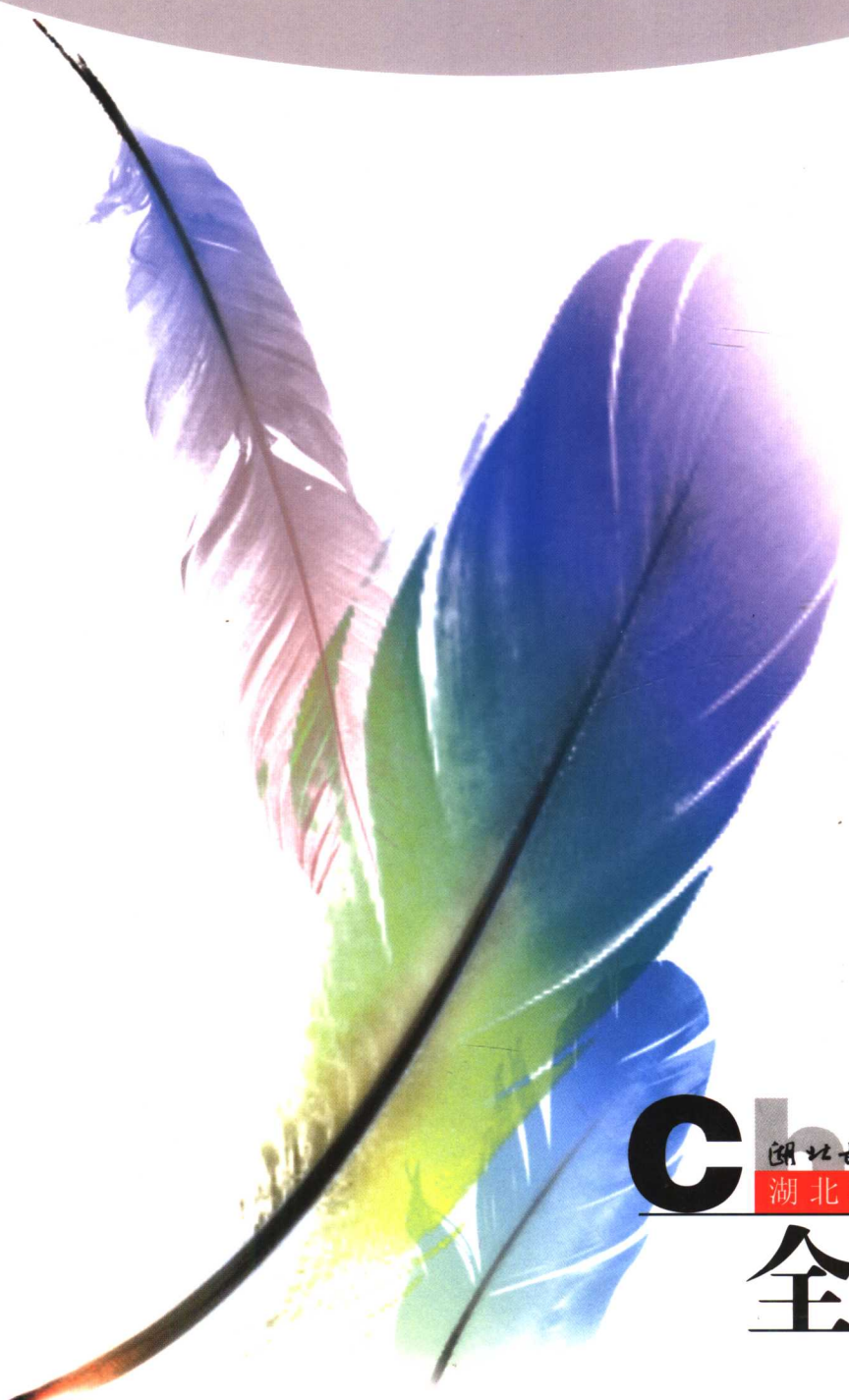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A History of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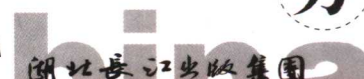
Translation in

中国翻译通史

马祖毅 等著



古代
部分

C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教育出版社

全一卷

A History of  China

中国翻译通史

中国翻译通史



China
全一册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A History of China

马祖毅 等著

古代部分
全一卷

中国翻译通史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教育出版社

总概述

人类自有语言以来,操不同语言的人们要交流思想,达到相互了解,必须通过翻译作中介手段。即所谓“洪荒造塔语言殊,从此人间要象胥”。

就中国而言,远在原始社会,各民族或部族之间,就应该有双语人或多语人的翻译活动,然而已无文献可征。即使在夏、商两代,现存的史料亦均失之过简。如《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有下列记载:

夏后即位七年,于夷来宾。

少康即位三年,方夷来宾。

“于夷”、“方夷”与夏、商王族并非同一部族,语言有殊,遣使“来宾”,必然需要翻译,否则无法进行活动。可这样说只是推测,拿不出证据。只有到了周王朝,才留下翻译机构和译员职称的记载,见《周礼》和《礼记》。因此,撰写中国翻译史,只能从周代开始。

周王朝及其后各个时代的政权,与周边诸民族(部族)或国家交往,都设置了配有翻译人员的外事机构。如周有大行人下属的象胥,秦有典客和典属国,两汉有大鸿胪和尚书主客曹,魏晋南北朝和隋有大鸿胪或鸿胪寺和主客司,唐有鸿胪寺、客省和礼部主客郎中,宋有鸿胪寺、中书省和礼部主客郎中,元有礼部下属的会同馆,明有鸿胪寺和礼部下属的主客清吏司,清有鸿胪寺、理藩院和礼部下属的会同四译馆以及后来改设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到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始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更名为外务部。民国及现在均称外交部,配有译员。本书“现当代卷”因限于篇幅,未能涉及外交方面的翻译活动。为此,“中国外交翻译史”尚有待其他学者编撰成书。

关于译员的称谓,周王朝按东西南北四方分别命名为“寄”、“象”、“狄鞮”和“译”,又总称“舌人”,当时主要从事口译。西汉王朝则有“译官”、“译长”之设。而“译人”、“译语人”一直为后世所沿用。文雅一点,则称译人为“象胥”或“寄象”。辽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中国翻译通史
古代部分·全一卷

朝始定口译者为“通事”，金、元、明、清皆因之；又定笔译者为“译史”，金、元因之。明朝的笔译人员，主要是四夷馆的“译字生”。清朝特设“笔帖式”，从事满、汉文字的互译和抄写；而为出使外国大臣、领事、副领事所配备的口笔译兼顾的人员则统称“翻译”和“翻译官”。总观二十五史，其所载各代的外事活动，往往略而不提口译人员，即使述及，亦不记姓名，尽管他们付出了不可或缺的大量劳动。因此，我有诗叹曰：

达志通情管送迎，
友谊花繁树常荣。
舌人碌碌风尘里，
青史无情不记名。

我国翻译至少已有三千多年历史，时间很长。早期翻译，多属与周边民族（部族）或国家的交往，接待来使或宾客，交流思想，皆以口译为主。而这些民族（部族）或国家的文明程度往往低于华夏，而且有些尚无文字。如《孟子·告子下》记载当时北方貉族的情况说：“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又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西南夷者……地方数千里，无君长，辫发，随畜迁徙无常。”两汉时与北方的匈奴族打交道最多。匈奴乃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且“毋（同无）文书”（《汉书·匈奴传》）。据此，文明程度较高的华族，不大可能大量吸收文明程度较低的周边民族（部族）的文化，除了物质方面如大宛马、蒲桃、胡麻、苜蓿等和某些艺术方面如龟兹乐、胡旋舞等之外。又因其尚无文字，不可能通过笔译去吸收。中国翻译史上最早的口译情况的记录，当是越裳国来使通过三象重译与周公姬旦的对话，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现存的匈奴民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只能是口译的汉语笔录。至于《汉书·匈奴传》所记“冒顿寝骄，乃为书使使遗高后（吕雉）曰：孤愤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愤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这段侮辱性的文字，并无匈奴文本，所谓“为书”，也只能是口译的汉文笔录。《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载的白狼王三歌（作于公元58—75年之间），虽有原歌的汉字记录，恐亦无白狼文文本，仅是田恭口译的汉文笔录而已。我国翻译史上有文本的笔译，当始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印度佛经的翻译。虽然最初的译经“率无原本，但凭译人背诵”，可是根据记载，黄武三年（公元224年），维祇难就带来胡本《昙钵偈经》，与竺将炎共译。竺法护（约230—308）随师游西域诸国，搜集大量经典原本带回长安。即使“但凭译人背诵”，还是先录下梵文原文，然后据以翻译的。以《阿毗昙毗婆沙》的翻译程序为例：“僧伽跋澄口诵经本，昙摩难提笔受为梵文，佛图罗刹宣译，秦沙门敏智笔受为晋（汉）文。”由此可见，到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是我国历史上的口译阶段。而从公元148年至今则应是口笔译并行的阶段。

季羨林先生曾把中华文化比作一条长河，它之所以永不枯竭，是因为不断有新水注入，历史上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见《中国翻译词典序》）。注入印度的水，是指中国翻译史上

第一次翻译(即佛经翻译)高潮;注入西方来的水,是指中国翻译史上第二次翻译(明末清初的西学翻译)、第三次翻译(鸦片战争到“五四”的西学翻译)高潮,以及当前的第四次翻译(改革开放以来的翻译)高潮。

从东汉末至北宋初的佛经翻译,延绵将近千年,其时间之长,可视为中国翻译史上的一大特色。这次翻译,是古代印度文化与中华固有文化,亦即东方文化之间所进行的互补性的平等交流。两者之间,虽有抵牾,但终于融合,成为中华文化一个组成部分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佛教。之所以如此,原因大致有二:一、印度佛教在传入时即依附和迎合本土文化;二、印度佛教本身也具有与中华文化相近或相通的因素,而且包含着可以补充中华传统文化的特定内容,因为“它们都是古代东方学者对人类自我反思的认识成果”(方天立语)。

与佛经翻译相比,明末清初和从鸦片战争到五四的两次西学翻译,是相对先进的西方文化与相对落后的中华文化之间的交流。这种交流,已打破了平等格局,并且带有巨大的冲击性,特别是后一次交流尤甚。

明末清初由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其主要内容是基督教义、古希腊哲学以及17世纪自然科学的若干新发现。基督教义,虽在唐代(景教)和元代(天主教)两次传入,但仅流行数十年即告中断,如昙花一现,影响不大。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奉教廷之命东来,其人数之多,译著之富,传播地域之广,均胜于前。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两种文化的冲突。明清两代所兴起的“教案”,即是明证;排斥传教士的杨光先甚至提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不得已》)。当时有识之士,虽有皈依天主教者,但他们对宗教的热情并不太高,尽管科学家徐光启曾有意利用基督教义来“补儒易佛”,但他们所热衷于学习和研究的,乃是传教士引进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科学方法论,目的在于用以反对当时“土苴天下之实事”的“名理之儒”和“谬言数有神理”的“妖妄之术”,把科学从理学蒙昧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试图“以会通求超胜”,达到国富而兵强。当然,明末和清初的交流情况,也应该加以具体区分,其中亦有差异,如清朝统治者重视历法、康熙皇帝酷爱科学。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局限在上层的少数有识之士的圈子之内,并没有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只能算是一个序幕。

与这一次相比,从鸦片战争到五四的中西文化交流,其规模要巨大得多,影响也深远得多,而此时的国势,也已今非昔比。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已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列强环伺欺凌之下,救亡图存,保国保种,已成为第一要务。爱国的有识之士,不得不向西方寻求真理。此时期所引进的西学,主要内容是随着工业革命兴起的现代科学技术、进化论学说、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古典哲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西学的传播,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西学输入以洋务派为主,其范围主要限于实用知识、应用科学和少数社会科学部门。他们主张“中体西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第二阶段是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甲午之战惨败,洋务运动破产。国势岌岌可危。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中国先进分子,从主张走变法维新的改良道路,发展到采取革命手段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特别在戊戌变法流产以后),从而使这阶段的输入西学运动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而输入的内容,则以为当时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s in China 中国翻译通史 古代部分·全一卷

政治服务的西方社会科学和哲学为主。勃然兴起、波澜壮阔的留学风潮,又大大推进了这一输入运动。又由于留学者以去日本的人数最多,日本遂成了输入西学的中转站,即通过日本向西方学习,通过日文翻译引进西方科学文化。在这一阶段内,文学翻译(主要是外国小说的翻译)也形成了极度繁荣的局面,译家辈出,译种繁多。文学作品之翻译,也密切配合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革命运动,向全国人民输送思想营养,激发团结御侮、奋发图强的爱国精神,宣传民主、自由、平等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从总的方面说,曾经起过不可忽视的启迪民智的作用。所以现在回头来评价当时的文学翻译,不能纯粹与外国作者、作品的正统地位挂钩,认为译者缺乏文学判断力,翻译能力不足或态度不佳,应该考虑到当时翻译的社会需求和标准,对之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当然,其中也有不少为迎合小市民庸俗兴趣而翻译的作品。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要求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个性解放,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启蒙运动。为了打破旧传统、改变旧思想,求助于西方,形成一次翻译西方文化的热潮。然而从1919年到1949年中,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社会动乱,翻译事业得不到正常有序的发展。

与晚清时期相较,五四以后的翻译,亦有其不同特点:一、祛除了过去“豪杰译”,任意增删等弊病,使译文更切合于原文,大大提高了翻译质量;二、自推行新文化运动以后,译文大多采用白话文;三、从事于翻译者多属留学回国的人员,他们既通外语,又学有专长。特别是从事外国文学翻译的人员,往往又是致力于创作的作家和诗人。而外国文学的翻译又促进中国新文学的建立和发展;四、科学翻译则着重于外国科学名著的介绍;五、哲学社会科学的翻译,除译介外国古典文献及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外,又开始有系统地译介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涓涓不绝,终于汇成巨流。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环境特殊,不得不一边倒,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一边倒地大量翻译苏联著作,在中国的文艺创作方面和学术发展方面也产生某些不良的影响。到中苏交恶时期,受政治影响,翻译俄文书籍的势头又逐渐减缩。“文革”十年,翻译出版领域,基本上成为一片荒漠,除了后期组织翻译一些基本上没有装帧设计封面的“白皮书”(如外国史地和政治人物传记等)以及少量的科技著作之外。

改革开放以来,在20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翻译出版事业蓬勃发展,形成中国翻译史上第四次翻译高潮。其原因是:一、改革开放,一下子打开了关闭很久的国门,五光十色的西方学术思想同时涌入,令人目不暇接,在国内连续兴起“美学热”、“文化热”、“方法热”、“管理热”、“海德格尔热”、“萨特热”、“解构热”、“后现代热”、“昆德拉热”……译介以上诸方面的著作,纷纷出版。有时同一著作,就有好几个译本。二、思想解放,冲破了以往的一个个禁区,为了吸收新的营养,顺理成章地大量介绍西方的各种理论、各种学术思潮和各种文艺流派。三、为了推进新时期的现代化建设,攻错于他山,不得不吸收世界文化中有利于我的积极部分。四、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又必然促进翻译事业的繁荣。

然而,南志刚先生在《新时期外来文化译介的巨大误区》一文中指出80年代和90年代的外来文化的译介还存在许多盲点盲区,还有许多问题。他说:“在西方文化被

大量地、重复地介绍的同时,与中国同属于发展中国家的拉美、非洲、亚洲的许多国家的文化对中国人来说还异常陌生;改革开放伊始,在长久封闭状态中,‘偷窥’世界文化的疑惧和睁眼看世界的惊喜交织在一起;伴随着政治环境和文化政策的宽松与严肃,中西文化交流一波三折,一方面是西方学术文化思想的大量涌入,一方面是文化破禁后对传统文化的寻根搜索,生吞活剥‘洋文化’和急躁复兴‘古文化’在振兴中国文化的旗帜下多次重演,甚至导致新派与旧派,传统与现代,国学和新学的严重冲突,不仅把许多国民引向困惑,而且文化学者们动辄陷入争论的困境,严重影响了文化交流和现代化进程。所有这些,均或多或少地暴露出新时期的文化交流工作,特别是外来文化介绍工作在文化态度、文化选择、文化观念、文化功能和文化精神等方面的严重缺陷。”南氏此论,值得参考。

从中国翻译的历史角度来看,各时期的翻译,往往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有关。例如佛教的传入,可以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作为奴役被统治者的精神武器,所以不少帝王鼓励或赞助译经。隋文帝杨坚就曾对灵藏和尚说:“律师度人为善,弟子禁人为恶,言虽有异,意则不殊。”释道安则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一个要利用,一个要依靠,二者一拍即合。统治者进行内部斗争,有时也利用译经来为自己造势。武则天为了给自己当皇帝制造宗教神学预言,曾指示一批和尚伪造《大云经》“陈符命”,说什么“即以女身,当王国土”。又为《华严经》作序说:“金仙降旨,《大云》之偈先彰;玉宸被祥,《宝雨》之文后及。”历代封建统治者都重视历法,认为是攸关社稷的大事之一。在唐代有太史监瞿昙悉达受诏译《九执历》。宋初修历,乃诏王处讷与马依泽编译《应天历》。明初则诏李翀、吴宗伯、回回大师马沙亦黑、马哈麻等译回回历、经纬度、天文等书。明末则由李之藻、徐光启、李天经等应诏组织传教士编译《崇祯历书》,后为清王朝所采用,定名为《时宪历》。林则徐禁烟时,为了知己知彼,特组织人员翻译《华事夷言》及滑达尔(瓦特爾)《国际法:适用于各国和各主权者的行为和事务的自然法原则》中的若干段落,以便与英国侵略者进行斗争。晚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的冲击下几乎垮台,为了苟延残喘,从1901年起陆续推行“新政”,以“掩人耳目”,“取媚外人”。在改定刑律方面,成立修订法律馆,任命沈家本和伍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法律,修订了民、商、刑等法。国民党统治时期,30年代曾大量介绍德国法西斯,并翻译了纳粹党纲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为国民党的独裁造势。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国民政府则视若洪水猛兽,对这方面的译著,明令查封,诬为赤化宣传。“七七”事变以后,中国进入抗战时期,涉及战争内容的作品很快成为文学译介的重要构成。据统计,1937年译出的英美反战作品就占到两国译作之和的20%,第二年骤升至54%,之后六年的比例在30%以上。而苏联卫国战争文学又成了三四十年代中国俄苏文学译介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这些译著得到广泛传播,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族入侵的斗志。建国后,政治上向苏联一边倒,苏联著作和作品又潮水般地涌入中国,形成译介中的跛足现象。改革开放后,以发展经济为第一要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出,掀起了科技著作的翻译高潮。凡此种种,都可说明社会政治对翻译的影响和制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因此在翻译历史上还有国内各民族的翻译问

of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中国翻译通史 古代部分·全一卷

题。就古代而言,有吐蕃时期印度佛经和汉籍的藏译,有新疆维吾尔族使用回鹘文时期的佛经翻译和使用察合台维吾尔语时期的波斯和阿拉伯的作品的翻译,有契丹政权(辽朝)和女真政权(金朝)的汉籍翻译,有党项政权(西夏王朝)的佛经和汉籍的翻译,有蒙古族政权(元朝)的蒙汉文互译以及后来佛经的蒙译,有满族政权(清朝)的满汉文互译和佛经的满译。关于以上各族的佛经翻译,藏文佛经主要译自梵文,少数转译自汉文;回鹘文佛经乃转译自古库本文、古焉耆文和汉文、藏文;西夏文、蒙文和满文佛经多转译自藏文和汉文。而傣族的傣文佛经则译自巴利文。金克木先生说:“我国有一大笔文化遗产现在没有整理,这就是那些从古代印度传来的佛教文献,大略有以下几项:一、汉语译的佛教文献,即《大藏经》中的原著部分。二、藏语译的佛教文献,即《甘珠尔》、《丹珠尔》。蒙古语译文可以算在这一系统之内。三、新疆和别处发现的古代一些兄弟民族语文字母写的或译的佛教文献。四、傣族的所谓“贝叶经”,其中应有抄写下的或翻译的佛教文献。五、西藏、新疆等地区陆续发现的古代印度语的各种字体写本,还有附汉译或藏译的原文写本或木刻本,各种文物中附的不同文字的印度语原文,这些多半是佛教文献。以上这些文献,是中华民族的财富,也是世界文化的、尤其是印度文化的重要资料”(《文化危言》)。

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即对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予以高度重视。1953年成立了民族出版社,1956年成立了中央民族委员会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局,1978年又成立了中央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民族语言翻译局(后改名为中国民族语言翻译中心),用蒙、藏、维(吾尔)、哈(萨克)、朝、彝、壮七个文种,出版了大量的译本。与此同时,对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又进行了搜集、整理和翻译。如彝族有史诗《阿细的先基》和长篇叙事诗《阿诗玛》,傈僳族有民间长诗《逃婚调、重逢调、生产调》,拉祜族有创世史诗《牡帕密帕》,阿昌族有神话史诗《遮帕麻与遮米麻》,布依族有长诗《古歌》,满族有《满族史诗》,瑶族有创世史诗《密洛陀》,纳西族有神话史诗《创世纪》,傣族有叙事诗《相勐》、《兰嘎西贺》、《召树屯》、《娥并与桑洛》等,水族有传说《刘三姐》,蒙古族有英雄史诗《江格尔》、《格斯尔传》和叙事长诗《嘎达梅林》,哈萨克族有爱情叙事诗《萨里哈与萨曼》,柯尔克孜族有英雄史诗《玛纳斯》,藏族有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裕固族有叙事长诗《黄黛琛》,等等。诗歌理论则有彝族奢哲的《彝族诗文论》、阿买妮的《彝族诗律论》,傣族马勐的《哇雷马约基哈傣》(《论傣族诗歌》)。所有这些都是少数民族绚丽多彩的艺术奇葩,均通过搜集整理翻译而得以保存,不至于湮没无闻。至于前述的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受到世界重视,其第一第二部的某些片断已有俄文、德文、英文、法文、土耳其文译本。联合国还曾把1995年定为“国际玛纳斯年”。这部史诗有8部20余万行,在建国后就着手搜集记录,积数十年之努力,在1984年开始陆续出版。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内容分60部左右,约六七十万诗行,一千多万字。五六十年代开始搜集整理,到1992年为止,已出版了10部。纳西族的东巴经共有五百多卷,其内容从历史、地理、人文、天文、历法、战争、家庭、婚姻、衣食、医药到文学、艺术、宗教乃至祭祀、占卜,几乎无所不包。国内学者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破译,经过数十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出版了千册百卷本《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这些译本,给中华文化宏伟殿堂增添了光辉灿烂的构建部分。

从佛经翻译开始,翻译家们就曾总结实践经验,探索翻译规律。如佛经翻译方面,有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彦琮的“十条八备”,玄奘的“五不翻”,赞宁的译经“六例”,而在最早的支谦《法句经序》中已初见“信达雅”的端倪。这些论述奠定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初步基础。在两次西学翻译中,有徐光启的“会通超胜”,李之藻的“真、实、奥义”,马建忠的“善译”,严复的“信、达、雅”,梁启超的“通学、通文”观,代表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精髓,构成了中国翻译思想的基础。从“五四”到1949年,有“直译与意译”之争,有“信与顺”的论战,又有形似神似的讨论。鲁迅、瞿秋白、郭沫若、成仿吾、林语堂等翻译大家所发表的评论,又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建国以后,译事大发展。其中茅盾的“意境说”,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论”,钱钟书的“化境论”,焦菊隐的“整体论”,继承发展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20世纪80年代,王佐良提出“新时期翻译观”,许渊冲发表“新译论”,叶君健又提出“精品论”,推动了中国翻译思想的发展。继董秋斯之后,谭载喜再次提出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建议,继而产生“传统派”与“西方派”之间的争论,各提方案,各执一辞。看趋势,中国翻译学的最终建立,将是进入21世纪的事了。



目 录

总概述	1
从周到清各朝外事机构之沿革与口笔译活动篇	1
第1章 周、秦与西汉	3
第2章 东汉、魏、晋、南北朝与隋	8
第3章 唐朝	18
第4章 宋、辽、金与元朝	25
第5章 明朝	32
第6章 清朝	41
宗教文献的翻译篇	63
第1章 佛教文献的翻译	65
一、从东汉到宋代的佛经翻译	65
二、西藏地区翻译佛教文献之概况	123
三、高昌回鹘族(或西州维吾尔族)的佛教文献翻译	133
四、西夏党项族的佛经翻译	138
五、云南傣族的佛教文献翻译	141
六、蒙古族的佛教文献翻译	142
七、满文《大藏经》的翻译	145
第2章 基督教文献的翻译	147
一、唐代景教徒的翻译活动	147

中国翻译通史 古代部分·全一卷

二、元代天主教徒的翻译活动	156
三、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宗教文献翻译	157
四、鸦片战争前后传教士翻译宗教书籍之概况	161
第3章 摩尼教经典的翻译	165
第4章 回族学者对伊斯兰教文献的翻译介绍	167
第5章 道教《太上感应篇》的彝译	176
中国境内各民族语言文字的互译篇	177
第1章 古代百越语的翻译	179
第2章 匈奴民歌的汉译	184
第3章 白狼王三歌的汉译	186
第4章 十六国和北朝民歌的汉译	189
第5章 吐蕃时期的汉籍藏译	197
第6章 契丹政权的汉籍翻译和译史、通事的设置	205
第7章 西夏党项政权的汉籍翻译	212
第8章 女真政权的特设翻译职称和翻译活动	218
第9章 蒙元的特设翻译机构和翻译活动以及元亡后蒙古族的汉籍翻译	222
第10章 新疆维吾尔族使用察合台维吾尔语时期的翻译活动	246
第11章 彝族的翻译活动	252
第12章 清朝的特设翻译机构与翻译活动	256
从东汉到清朝初年的科学翻译篇	277
第1章 从东汉末到明朝的科学翻译	279
一、医术药物方面	279
二、天文历算等方面	291
第2章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士大夫相结合的西学翻译	302
从鸦片战争到清末的西学翻译篇	345
第1章 组织翻译的第一人——林则徐	347
第2章 西方传教士的西学译介	352
第3章 洋务派机构的西学翻译	373
第4章 甲午战争后的西学翻译	387
第5章 译名统一问题	442

从东汉到清代的文学翻译篇	445
第1章 从东汉末到清代同治年间的文学翻译	447
第2章 光、宣年间(1875—1911年)的文学翻译	477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从周到清各朝外事机构 之沿革与口笔译活动篇



第 1 章

周、秦与西汉

周朝国君姓姬,相传是帝喾后裔弃的子孙,世代重农。从公刘起居豳(今陕西旬邑县),到第十世古公亶父因受戎狄侵略,被迫迁居岐山下周原(今陕西岐山县),筑城郭居室,建立了初具规模的周国。公元前 11 世纪中叶,武王伐纣,取商而代之。后周公杀武庚,实行大封建,让周王的子侄、同姓贵族和异姓贵族于王畿(方千里,是王的直接统辖区)之外建立封国。在其势力范围内和势力范围外,还有许多部族国家,这些国家与周并非同姓,亦非同族,语言有殊,若来朝贡,势必有双语人或多语人为中介,方能交流思想。《册府元龟·外臣部》就有外族或外国前来朝贡的记载:

周武王克商,西旅献獒,太保作《旅獒》以戒王。自是道通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贡楛矢石弩,长尺有咫。

后芒即位三年,九夷来御。

宣王时,追貌之国来贡。故韩奕之诗曰:“献其貔皮,赤豹黄黑。”

西旅、肃慎、追貌等外族的贡使来了,必有接待之处,语言不通,又必有传译之人。因此,在流传下来的古代文献中,遂有周代外事机构和翻译职业的记载:

一、《周礼·秋官》:“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十二人。”“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喻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言辞传之。”

二、《礼记·王制》:“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

象胥,乃大小行人的属官。按《周礼》:“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大戴礼记·朝事》云:“《礼》:大行人以九仪别诸侯之命,等诸侯之爵,以同域国之礼而待其宾客。”小行人,是大行人的副手,“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周礼》)。由此可见,象胥的具体任务,是负责接待四方民族和国家的使节与宾客以及通译事宜,下属办事人员,有上士、中士、下士和徒等 31 人。考之周代诸侯官制,上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中国翻译通史 古代部分·全一卷

士是居于大夫之下的士一级爵位的第一等,中士和下士各居第二和第三等。

又据《周礼·秋官》载:“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这是说周朝每七年将象胥集合起来培训一次。

这里要先谈一下“中国”和“四方”。

孔子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裔,指夏以外的地;夷,指华之外的人。这种区分,十分明显。不过,中国、夏、华这三个名称的最基本的涵义还是在于文化。高文化的地区,即周礼地区,称为夏;文化高的人或族,称为华。华夏合起来,称为中国。对文化低,即不遵守周礼的人或族,称为蛮夷戎狄。这些族国所居之地,称为四方。(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第1册)

周代时的“东方”,多在今山东省境内。那里有莱夷、任、宿、须句、颛臾、邾、莒、小邾、杞、介、郯、根牟,通称为东夷。凡翻译东方诸族语言者,称之为“寄”。孔颖达疏:“寄,言传寄外内语言。”

周代时的“南方”,指长江汉水两流域的蛮族所居之地,有群蛮、百濮、卢戎等,通称南蛮;又指淮水流域的夷族所居之地,小国有舒、六、蓼、舒蓼、舒庸、舒鸠、宗等,大国有大徐,通称淮夷。凡翻译南方诸族语言者,称之为“象”。孔颖达疏:“象者,言放(同仿)象外内之言。”

周代的“西方”,在今山西、陕西、甘肃一带,有大戎、小戎、骠戎、犬戎、姜戎、茅戎、扬拒、泉皋、伊雒之戎。戎族酋长戎子驹支曾经说过:“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贄币不通,言语不达”(《左传·襄公十四年》)。那里还有白狄、赤狄。赤狄有皋落氏、廆咎如、潞氏、留吁、铎辰。这些通称为戎狄。凡翻译西方诸族语言者,称之为“狄鞮”。孔颖达疏:“鞮,知也。谓通夷狄之语与中国相知。”

周代的“北方”,在今河北省境内,有北戎、甲氏、鲜虞、肥、鼓、无终,通称北狄。凡翻译北方诸族语言者,称之为“译”。《论衡·变虚》说:“四夷入诸夏,因译而通。……虽五帝三皇不能去译。”孔颖达疏:“译,陈也。谓陈说外内之言。”

在周代,译员除上述职称外,又统称“舌人”。据《国语·周语》:“夫戎狄冒没轻儻,贪而不让……其适来班贡,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诸门外,而使舌人体委与之。”韦昭注曰:“舌人,能达异方之志,象胥之职也。”古代又称外国语言为“反舌”,见之于《吕氏春秋》高诱注:“戎狄言语与中国相反,故曰反舌。”故孔子说:“传言以象,反舌皆至。”(《大戴礼·小辨》)

周代诸侯之国也设有行人。如当时的吴国,是周太王之子太伯所创建。太伯让位于其弟季历,“乃奔荆蛮,文身断发”,“自号句吴”。《史记·吴太伯世家》说,吴“王寿梦二年(公元前584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将子反而奔晋,自晋使吴,教吴用兵乘车,令其子(狐庸)为吴行人,吴于是始通于中国。”荆蛮语言,不同于中国,故其在“通中国”时,必有译人。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